

# 美国近代民权之母--罗莎·派克斯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

如果回顾一下美国近代的民权运动发展史，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发展史，就会发现那是以和平、暴力与法制三种方式来交叉进行的：第一种美国近代民权运动模式是和平抗争。这以马丁·路德·小金恩牧师为代表。

金恩以“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民权平等，这不但使他成为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精神领袖，受到美国人民的赞扬，还得到了国际间的肯定，使他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金恩的伟大形象已经跨越一国一州，成为全世界追求民权者和受压迫的黑人们的偶像和希望。小金恩被刺杀后，他所追求的全美国人民的民权平等理想，并没有及身而终，他用鲜血与生命唤醒了美国人民的良知，也唤醒了美国普遍大众的民权平等意识。

金恩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讲演《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这次划时代的讲演已随着他愈来愈大的影响力而家喻户晓。金恩被美国人民誉为美国历史上继乔治·华盛顿总统和亚拉伯罕·林肯总统之后，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第三位伟人。

1955年12月1日是美国民权运动的特别纪念日。这一天既是改变金恩命运的一天，也是改变美国民权运动的一天，更是改变美国历史的一天。

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巴士上，罗莎·路易斯·派克斯公然地挑战已经在阿拉巴马州履行多年的《吉姆·乌鸦法律》，她后来被美国国会誉为“美国近代民权之母”。

该项法律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黑人只能坐在后面，黑人必须要让位子给白人。而当时先上车已经就座的派克斯拒绝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后上车的白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非洲裔美国人与白种美国人为了公车位置而发生的公开冲突。

早在1944年，非洲裔美国人运动健将杰基·罗伯逊(Jackie Robinson)在德克萨斯州的富特胡德堡(Fort Hood)，就曾经因在公共巴士上拒绝让位给一位后上车的白人军官而发生冲突。

这个抗争行动直接导致他被美国军事法庭所审判。但是并非每一个法庭都允许《吉姆·乌鸦法律》来横行霸道：美国军事法庭的法官就现场宣判被告罗伯逊无罪，并将案件撤消。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1955年3月2日，当时就读于“布克·托利弗·华盛顿中学(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High School)”的15岁学生克劳黛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在巴士上拒绝让位给一位白人。

结果是被几个彪形大汉般的白人警察，像对付江洋大盗一样，威风凛凛地冲上巴士，将这个手无寸铁但是性格刚强的非洲裔小女孩用手铐反铐起来，白人警察并没有理会科尔文“这是我不可让渡的宪法权利！这是我不可让渡的宪法权利！”的大声疾呼，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拉带扯地硬将她推下了车。可惜的是，此事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结束了，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环境，方可成事。

年纪轻轻的科尔文其实并非等闲之辈，她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分部青年部的小部长，而她的上级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了美国近代民权之母的派克斯。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领导人决定不将科尔文事件扩大处理的另外两个原因是：第一，她在被拘捕时，不停地用污言秽语来辱骂警务人员，没有把道理占好；第二，她过早地与一个和她年龄相差太过于悬殊的已婚白人男性发生性关系，并且已怀孕在身。

从道德的层面上来说，这很难有强大的说服力来发动广大群众为此参与抵制或示威的行动，即使在法庭上，也很难逃过对方律师利用这个道德弱点来丑化她的形象，更难凭此得到陪审团的认同与支持，虽然她有理，但是几乎没有在法庭上取胜的可能。

经过了无数次沙盘式的推演和反复辩论，大家觉得应该先忍辱负重，再待良机。等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守株待兔的派克斯身上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派克斯是土生土长的阿拉巴马人，她于 1913 年 2 月 4 日在阿拉巴马州的特斯基吉市(Tuskegee)出生。她的父亲詹姆斯·麦考利(James McCauley)是一位规规矩矩的木匠，母亲丽奥娜·爱德华兹(Leona Edwards)是一位备受当地社区尊重的小学老师。

派克斯自小体弱多病，有长期慢性的扁桃腺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非洲人卫理圣公会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终身会员。少年时的派克斯，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化的教育，只是在家里由她母亲亲自调教，但却成绩非凡。

一直到了 11 岁，派克斯才第一次踏进学校的大门。读了没有几年，就因为她的老祖母和母亲双双病倒在家，而不得不离开她心爱的课堂，回家照顾二位亲人。在学校读书时，就曾亲身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可恶。市政府的公车校车，只接送白人的孩子上下学，黑人孩子，只能自己步行到校上课和回家。

派克斯曾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形容她对这种种族歧视的感受的：“我每天都看见校车来来去去，对我而言，这就是生活的方式，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这种习惯性的生活。在校车巴士的事实里，使我感到人间有着白人和黑人两个世界。”

对于一个弱小心灵的摧残，对于人性尊严的侮辱，莫过于种族歧视。在派克斯小的时候，那些嚣张跋扈而且横行霸道的“三 K 党(Ku Klux Klan)”游行队伍从她家大门口经过时，当她看见老祖父手持长枪站在大门后面保护家人时，她亲身体会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仇恨与悲哀。

1932 年，派克斯与理发匠雷蒙德·派克斯(Raymond Parks)在她母亲的家中结婚。婚后在丈夫的鼓励下，她返回学校完成了中学课程，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这在当时全国只有 7%的非洲裔美国人有中学毕业文凭，尤其是在种族歧视极端严重的南方阿拉巴马州来说，更是一件相当不易之事。

派克斯的丈夫雷蒙德·派克斯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会员。这对派克斯的思想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从 1943 年开始，派克斯就开始积极地介入到阿拉巴马州的民权运动中，并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成为该组织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分部的会员，并当选为分部总裁埃德加·尼克松(Edgar Nixon)的义工秘书。她当时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分部里唯一的女性会员。

有一件人神共愤的血案，不但促使派克斯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地介入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民权运动中，同样鼓舞了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士气，同时也唤醒了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意识，那就是惨无人道的埃米特·路易斯·宝宝·悌尔(Emmett Louis Bobo Till)谋杀案。

十四岁的悌尔是个毫无人世经验的天真无邪的调皮孩子，他于 1941 年 7 月 25 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出生，他母亲玛米·卡特翰(Mamie Carthan)是一位刚强而且有主见的非洲裔美国人女性。卡特翰于 1921 年在密西西比州塔拉哈特棋县(Tallahatchie)出生，两岁时随双亲搬移到外号“小密西西比”的伊利诺州州阿尔戈(Argo)定

居，意图摆脱塔拉哈特棋县的白人威胁和穷困环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密西西比州塔拉哈特棋县，是当时美国南方非洲裔美国人的写照，在白人家庭平均每年有 690 元收入时，他们只有 462 元，换成现在的市价是 4,250 元。更糟糕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没有投票权，也没有任意的法律保障，自 1882 年开始，单密西西比州一州，就有超过 500 名非洲裔美国人被“三 K 党”私刑暴力处死，美国宪法中的权力条款，在那里有点像传说中遥不可及的神话。。当时密西西比州是美国最穷苦的州，而塔拉哈特棋县又是在密西西比州里最穷的一个县。

悌尔的父亲路易斯·悌尔(Louis Till)则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1942 年，玛米发现路易斯是一位暴力犯罪案底累累的积犯而要离开他时，被路易斯掐着脖子，导致昏迷不醒，几乎丧命。在法庭上，法官除了下令路易斯永远离开允许玛米外，还允许他有两个选择：强制坐牢或自愿参军，路易斯选择了后者。

路易斯在 1943 年被美国陆军征召入伍，派往意大利服役。在意大利服役期间，路易斯恶性难改，因为犯下强奸两名妇女与谋杀一名妇女的罪行，被美国陆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5 年 7 月在意大利被执行吊刑。

玛米在 1951 年改嫁予(Pink Bradley)后，全家搬迁至芝加哥市定居。1955 年时，14 岁的悌尔身高 5'4"，体重 150 磅，看起来像个成年人。

1955 年 8 月 21 日，悌尔从芝加哥市到密西西比州蒙尼(Money)，去他舅祖父摩西·赖特(Moses Wright)的家小住，没想到这个原本是充满激情的暑假之旅，却变成了一趟死亡之行。时年 64 岁的赖特是一位善良的工人，业余时间则在教堂担任牧师助理，偶然客串一下牧师，是当地非洲裔美国人眼中的长者和好人，都以“传教士”呼之。

蒙尼是密西西比州靠近格林伍德(Greenwood)的小镇，全镇只有一家学校，一间邮局，一所教堂和三间小杂货铺，为全镇 58 位居民提供着基本生活的需求。

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布朗 诉 教育局》后，黑白种族间显得异常的紧张。在悌尔到来的前一个星期，在密西西比州布鲁克黑文(Brookhaven)法院门口，一位黑人民权运动分子(Lamar Smith)被“三 K 党”当众用枪射杀，而法院居然宣判该凶手无罪释放。

1955 年 8 月 24 日，悌尔和表哥惠勒·小帕克(Wheeler Parker, Jr.)到街头白人开设的小杂货店买糖果，悌尔向帕克出示了自己在芝加哥的几张相片，其中有一张是自己的好友和他白人女朋友的照片，帕克不相信一个黑人能够会有一个白人的女朋友，向悌尔戏言说：“你敢和那位白人老板娘说话吗？”

悌尔神气地点了点头，临出门前，悌尔朝着 21 岁的白人老板娘卡罗林·多纳姆·布赖恩特(Carolyn Dunham Bryant)挤了挤眼睛，吹了声口哨，再淘气地说：“再见，可爱的(Bye, baby)！”这句话成了悌尔在三天后被毒打至死的祸根。

多纳姆觉得自己被一个“小黑鬼”用语言来调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盛怒之下，冲到停在门外的汽车上取出手枪来“自卫”，但在返回店里时，发现悌尔和他的同伴已经被吓得消失了。悌尔恐怕惹祸，不敢把事情告诉赖特，只是说想早点返回芝加哥老家。

1955 年 8 月 27 日，刚从运输鲜虾到德克萨斯回来的 24 岁白人罗伊·布赖恩特(Roy Bryant)，听到老婆多纳姆“被黑人调戏”的故事后，找来了 36 岁的同父异母哥哥杰克·米拉姆(Jack Milam)，商量着如何出这口“恶气”，和如何“给那个小黑鬼一个教训”。

1955年8月28日凌晨2:30，布赖恩特带着他的老婆多纳姆和米拉姆，敲开了赖特的大门，并伪装成两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很客气有礼地问道：“你家是否有个来自芝加哥的小黑男孩？”

忠厚老实的赖特还没有搞清楚这两位满肚子坏水的白人的来意，随即据实相告说是有的，并回头大声叫醒了正在梦乡里的悌尔，让他从床上爬起来和他们相见。

睡眼惺忪的悌尔站在他舅祖父赖特家的大门口，还没有搞清楚出了什么事时，布赖恩特即露出了他原本的狰狞嘴脸，转头问他老婆道：“是他吗？”米拉姆恶狠狠地用指头点着悌尔说：“就是他！就是他！”

布赖恩特一个箭步冲向前，将悌尔劈胸一把揪起，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揪着小小的悌尔，并强行地将他推到卡车的后面，扬长而去。悌尔的舅祖母拿出了家中仅有的一点钱，双手捧着要交给米拉姆，祈求交换悌尔的安全，但是被这两个强盗不肖一顾。

临行前，米拉姆用手枪和手电筒同时指着赖特，恐吓他说：“不得报警，否则回来宰了你！”赖特被突然其来的事情惊吓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

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将悌尔用车载到数十里外的太阳花郡(Sunflower County)郊野黛尔塔(Delta)的克林特·旭尔丹农场(Clint Shurden Plantation)棉花地里，黛尔塔是一个种族成见极深的僻静小镇，人口527人，其中一半是黑人。

两个暴徒先将悌尔痛打了一顿，然后用私刑将其处决。据后来官方的验尸报告纪录称，悌尔在死前，两个眼球曾活生生地被人用硬物打得突了出来，可见对方残忍和暴烈的程度。

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的威风，并没有因为小悌尔的眼球被打掉而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布赖恩特更凶狠地掏出手枪，朝着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埃米特·悌尔的脑袋，连开了数枪，将他的脑浆打得飞散在盛开的棉花地里。

根据后来目击者的证词指出，悌尔被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毒打时，痛苦难忍，大声地不停哀号道：“妈妈救我！妈妈救我！仁慈的主救我！仁慈的主救我！”但是悌尔的母亲和他“仁慈的主”都救不了他，因为铁是心肠的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却对此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

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把毫无抵抗力的悌尔残杀后，把他的尸体丢到卡车后面，覆以油布，凶手们开车回到小镇，停在布赖恩特自己的商店前，当人们发现有鲜红的血液顺着车边流下来时，米拉姆狞笑着解释说：“刚猎杀了一头野鹿！”但当碰到几个黑人过来观看时，布赖恩特却故意揭开油布，指着悌尔的尸体向他们恐吓道：“这就是聪明黑鬼的下场(that's what happen to smart niggers)！”。

冷血的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将悌尔谋杀后，用带钩子的铁丝线将一部75磅重的烂栏杆绑在他的脖子上，运到附近的塔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边，抛尸河中。

悌尔失踪后，他舅舅赖特只得报警处理。密西西比州勒弗里县警长乔治·史密斯(Sheriff George Smith, Leflore County)亲自找到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后，他们坦白地承认的确是将悌尔带走，但在谈完话后就将他放走了，其余之事，推得一干二净。

悌尔的失踪，引起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分部秘书长麦德嘉·埃弗斯(Medgar Evers)，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州玻利瓦尔郡(Bolivar County)分部秘书长艾米·穆尔(Amzie Moore)两人的高度重视。

加上非洲裔美国人作家霍尔丁·卡特二世(Holding Carter II)的紧追不舍，并发动新闻舆论，致使得密西西比州蒙尼市警方的办案人员，不得不将调查的重点，集中在柏尹特和米拉姆两兄弟的身上。

1955年8月31日，漂浮的悌尔的尸体被在皮拉哈奇河钓鱼的两个小孩子发现了，一件划时代的惊人私刑处死谋杀案，就此爆发。但由于尸体泡在水里时间过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密西西比州蒙尼市的警方还有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异口同声地说这具腐尸，并不是悌尔。

后来悌尔的母亲玛米从尸体手上的戒指，确认无误的指出，这就是她那失踪了三个月的心爱的儿子，因为那个戒指本来属于悌尔父亲的遗物，是她在儿子从芝加哥启程前往密西西比州蒙尼市看望他舅祖父之前，送给他儿子作为纪念和祝福的礼物，更重要的是，玛米指出戒指内环刻有“L. T. May 25, 1943”几个字，鉴定之下，丝毫不误。

悌尔之死引发了两极式的反应。密西西比州第45任州长休·劳森·怀特(Governor Hugh Lawson White)公开谴责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谋杀罪行，他除了下令彻底追查凶手归案外，还向“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发了一封“深表痛惜和遗憾”的电报，“密西西比州绝对不会容忍这种冷血暴行，必定彻查到底。”

1955年9月1日，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每日新闻报(Jackson Daily News)》在头版发表悌尔之死的新闻时，加以评论说：“在让这种白垃圾恶棍毁灭我们之前，所有爱护密西西比州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制裁之。”

悌尔之死并没有使所有的密西西比州居民愤怒，比如祸害美国社会一百多年的“三K党”就是最好的例子。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协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s)”和“冷战(Cold War)”这两个臭名昭彰的“三K党”，幸灾乐祸，借机放毒，散发负面消息。

“白人公民协会”的秘书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居然在《格林伍德共和国报(Greenwood Commonwealth)》上公开指出悌尔之死，是美国政府没有把种族隔离政策执行好的必然结果，假使全部把黑人隔离起来的话，悌尔有可能就不会被处死。

密西西比州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奥利弗·伊斯特兰(US Senator James Oliver Eastland)和约翰·科尔内琉斯·斯滕尼斯(US Senator John Cornelius Stennis)是两位典型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者。研究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都是民主党的伊斯特兰和斯滕尼斯的厌恶有色人种记录，已经是路人皆知之事。

伊斯特兰自1943年1月3日至1978年12月27日，出任密西西比州美国参议员长达35年之久，斯滕尼斯自1947年12月5日至1989年1月3日为止，出任密西西比州美国参议员长达42年之久，在南卡罗来纳州詹姆斯·斯特罗姆·索尔蒙(US Senator James Strom Thurmond)和厄内斯特·弗雷德里克·霍林斯(US Senator Ernest Frederick Hollings)两位美国参议员之前，他们是美国参议院中最资深的两位。

伊斯特兰和斯滕尼斯这两位种族主义者在知道了悌尔被残暴杀害后，不是去为冤死的悌尔伸张正义，不是去安抚悌尔的母亲，也不是督促着缉拿凶手归案，而是通过自己的特殊政客身份，到处去找悌尔早就该死的黑材料。

在他们没法在一个14岁的孩子身上找到使他们兴奋的黑材料后，把精力放在悌尔的父亲身上，在他们发现了悌尔的父亲路易斯是一个强奸和谋杀犯时，大喜过望，于是背后放风给媒体，在悌尔的谋杀案开庭前后，炒作得沸沸扬扬，期望能够把悌尔打扮成了“强奸谋杀犯的儿子”。

美国海军共有11艘超级核子航空母舰，其中在1993年11月11日命名，1995年12月9日开始下水服役的“约翰·斯滕尼斯号(USS John C. Stennis)”，就是以斯滕尼斯的名字来命名的，真乃美国精神之耻也。

1955年8月29日，密西西州司法部拘捕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控以“绑架”罪名，1955年9月19日开庭审讯。在“三K党”的财力支援下，两个凶手聘请了由约翰·科仑(John Kellun)领军，西德尼·卡尔顿(Sidney Carlton)、哈尔韦·亨德森(Harvey Henderson)、约翰·小惠滕(John Whitten, Jr.)、杰克·布雷兰(Jack Breland)四位著名的刑事律师，组成了强大辩护团抗告。年龄65岁的布雷兰有40年的刑事辩护经验，小惠滕的叔父是美国众议员杰米·惠滕(US Congressman Jamie Whitten)。

主控官是有14年检察官经验的杰拉尔德·查特曼(Gerald Chatman)，他的副手是罗伊·史密斯三世(Roy Smith III)；这是查特曼的第四个任期，他结婚23年，有四个孩子，他的岳父是密西西比州法官赫伯特·霍尔姆斯(Judge Herbert Holmes)；当惠滕辞掉检察官的职位而当选美国众议员后，查特曼递补了他的空缺，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经宣布要在年底退休，因而悌尔的案件将会是他公职生涯中最后的一件棘手大案。助理检察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出身的史密斯三世，他被怀特州长提名后，在位已经五年。

开庭那天，炎热无比，95度的温度使大家无精打采，连在场维持次序的警长都把外衣脱掉，坐堂法官柯蒂斯·史旺戈(Judge Curtis Swango)特别允许陪审团喝冷啤酒解暑。

年龄47岁的史旺戈法官在出任法官前，曾出任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长达15年，在杰克逊市“尔萨普大学(Millsap College)”毕业后，又在“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取得学位，为人谦虚有礼，结婚12年，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言论和纪录。

法庭的听众黑白两族分隔而席，加重了种族歧视的气息，有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到来，法庭安排了22位白人记者和4位黑人记者在前排，以便使他们更容易听到辩辞，由于太拥挤，而22位白人记者已经占了位子，只有一位黑人记者有位子，当另外三位黑人记者想坐在白人记者身旁时，遭到白人记者的怒斥：“我们这里不黑白混坐，别尝试着开成先例！”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控方的证人除了塔拉哈特棋县正、副警长、副警长、勒弗里县警长、萨姆纳县(Sumner County)正、副警长、密西西比州法医、塔特怀勒市市长(Tutwiler)外，还有悌尔的舅祖父、母亲和亲戚西米恩·赖特(Simeon Wright)。

悌尔的家人，全是对法律一无所知的良民，在审判中，在五位著名刑事律师的交叉盘问下，在紧张的心情下，其供词显得矛盾百出，语无伦次，失态连连，简直溃不成军。自1955年9月24日开始的一连五天审判中，整件案情的重头戏似乎是集中在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的“无辜”，而不是悌尔的惨死上。更重要的是，检方的准备工作不足，甚至于无法在法庭上提出在皮拉哈奇河浮起的腐烂尸体就是“失踪”的悌尔的证据。

按照密西西比州的法律，像悌尔这样的一级谋杀案件，陪审团只有三个选择：死刑、终生监禁或无罪释放。在全是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要他们为了一个“小黑鬼”之死而判处两位白人的死刑或终生监禁，在密西西比州的大环境下，似乎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那么陪审团的选择只有让两个凶手逍遥法外了。

1955年9月23日，在12位全是白人男性组成的所谓的陪审团的偏见下，前后只用了67分钟，就达成了使人无法接受的结论：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法官史旺戈根据陪审团的意见，宣布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无罪释放。

如果认为67分钟的时间就能决定了一条生命是儿戏的话，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比如该案的陪审团就不是这么想的。事后，其中一位陪审团团员满腹怨言地唠叨，说如果不是大家多喝了点啤酒的话，哪里会用得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使人无法接受的裁决，在多位主要黑、白记者的现场报道和深入发掘下，悌尔的被残暴私刑处死故事立即传遍了全世界。这些珍贵的新闻资料，为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留下了扎实而有力的原始证据。

这些不畏黑势力而为悌尔支持公道和伸张正义的黑人记者有《菲美新闻报(Afro American Newspaper)》的詹姆斯·希克斯(James Hicks)、《艾伯尼杂志(Ebony)》的西米恩·布克(Simeon Booker)(Clotye Murdock)和戴维·杰克逊(David Jackson)、《圣路易斯阿戈斯报(St.Louis Argus)》的总裁南妮·米切尔·图尔纳(Nannie Mitchell Turner)与记者史蒂夫·邓肯(Steve Duncan)和威廉·法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卫权杂志(Defenders Publications)》的亚历克斯·威尔逊(Alex Wilson)和厄内斯特·威瑟斯(Ernest Withers)等。

主要的白人记者有《孟菲斯新闻短弯刀报(Memphis Press-Scimitar)》的克拉克·波蒂厄斯(Clark Porteus)、《纽约时报》的约翰·波帕姆(John Popham)、《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吉姆·基尔加伦(Jim Kilgallen)、保罗·伯顿(Paul Burton)、《纽约邮报》的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威廉·德斯蒙德(William Desmond)、《孟菲斯商业呼吁报(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的约翰·冈特(John Gunter)等。

悌尔私刑处死案的法律程序结束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是凶手，但在强大的律师团的护航下，躲过了法律的制裁。法庭的战役完了，但是悌尔私刑处死案的故事才刚开始。

美国司法系统里，有一条司法原则：刑事罪行不可“一罪二告(Double Jeopardy)”。这条立法的原意，是要约束政府不得滥权，对于公民所犯下的刑事罪行，只允许起诉一次，籍此达到保障公民权利之目的。

基于这条法律的保护，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不但逍遥法外，还收了《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的四千元，做为和盘托出事实真相的代价。在他们律师的办公室里，这两位满手沾着埃米特·悌尔鲜血的“三 K 党”凶手，竟然大言不惭地直接记者威廉·布拉德福德·休伊(William Bradford Huie)承认，的确是他们将悌尔杀害并将之弃尸于皮拉哈奇河中的。

这篇报导就像一颗炸弹，在全美国各个非洲裔的社区里轰传开来，也刺激着全美国人民的良知、神经、道德、勇气和智慧。一场美国近代史上波涛汹涌而悲壮雄伟的民权运动，紧跟着悌尔这条信管的点然而汹涌澎湃地发展了起来。

玛米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把悌尔的尸体运回芝加哥老家安葬在大果栎坟场(Burr Oak Cemetery)。在悌尔出殡时，义无反顾地顶住芝加哥市政府和殡仪馆不可以开棺示众的庞大压力，坚持开棺而祭，她要让全天下的人，亲眼看看她的儿子是如何被凶残的“三 K 党”无辜残杀而致死的！

消息传出，举市震惊，共有超过五万人到“雷纳殡仪馆(A. A. Rayner Funeral Home)”排队瞻仰悌尔的遗容，悌尔躺在棺材里的臃肿腐烂和遍体鳞伤的相片，透过新闻报纸的流传而爆发出来的力量，胜过十万雄师！

这场残忍而且无良知的人间悲剧，强烈地震撼着整个国家，也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美国人的良知。人们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谁无骨肉之亲？谁无子女之情？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导致如此这般地被残害致死？

如果说悌尔“犯”了什么“罪行”的话，那就是两大“罪行”：第一个“罪行”是悌尔与他的玩伴到凶手布赖恩特和他老婆多纳姆在蒙尼开的一间住家式小型杂货店购买糖果时，向着他的老婆吹了一下口哨，扮了一个鬼脸；第二个“罪行”便是上帝在他出生时，将他降生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这就是悌尔全部的“罪行”。

举头三尺有神灵，无辜的悌尔是不会白死的。他的惨死，不但为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拉开了序幕，唤醒了美国白种人民内心的良知，也点燃了使美国走向现代文明的火炬。

1991 年，芝加哥市位于第 71 街长达 7 英里的街道，被重新命名为“埃米特·悌尔纪念公路(Emmett Till

Memorial Highway)”，用来纪念这件人间的悲剧，藉此作为一个警钟，来提醒世人，要让世人永远不要重犯历史的错误。

2005 年，悌尔儿时曾就读过的学校，原名是“詹姆斯·麦科什数学与科学学院 (James McCosh Math and Science Academy)”，为了纪念这场划时代的悌尔血案，更名为“埃米特·路易斯·悌尔数学与科学学院 (Emmett Louis Till Math and Science Academy)”，这是芝加哥市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小孩子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院。

2004 年 5 月 10 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将重新调查研究悌尔谋杀案，调查除了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涉入此案。联邦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布赖恩特的前妻多纳姆，使她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lexandria Acosta) 为当年的悌尔谋杀案发布新闻稿说：

“埃米特·悌尔谋杀案是美国人民民权运动的中心点，这起残忍而且凶恶的冷血谋杀，丑陋而且偏见的司法行为，使整个国家蒙羞。它激励和推动了美国人民近代的民权运动。我们不但亏欠埃米特·悌尔，同时也亏欠我们自己，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我们仍然要看看还能为正义和司法做些什么。”

2007 年 3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 8,000 页有关“埃米特·悌尔谋杀案”的调查记录，其中有 354 页是由 1955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的法庭审判记录。

在开馆验尸后，美国司法部用一副新的棺木安葬悌尔，然后把旧的棺木捐给美国“史密斯森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协会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ion)”，作为后世美国人的警惕案例。

美国联邦调查局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发表了《埃米特·路易斯·宝·悌尔谋杀案调查报告书》，除了确认布赖恩特和米拉姆两兄弟是谋杀悌尔的凶手外，还证实了悌尔是因为头部中枪，和多处骨头被打断而导致死亡的。

1980 年，凶手米拉姆死于癌症，人既然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伤感的了。但是另外一位凶手布赖恩特，却是特别的难过和伤感，而且是非常的难过和伤感，因为他觉得当年自己心里没数没底，失去了一个弄大钱的机会。

1994 年凶手布赖恩特，恶贯满盈，也以癌症终结了他罪恶滔天的一生。他在临死前的几个月，对着一个新闻记者抱怨说，其实他并没有弄到多少钱，还要和他的兄弟米拉姆平分，更是所剩无几了，为了此事，他不但赔上了自己的声誉，还招来了许多的藐视，有点划不来。

凶手布赖恩特并不是因为冤死的悌尔而难过伤感，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良知遭到谴责而难过伤感，竟然是为了没有把握住行凶杀人的好机会，从而多弄点钱来享受人生而难过伤感！这正彰显了“三 K 党”丑陋的伪善人性。

悌尔的母亲玛米虽然是有着丧子之痛，但却是福寿命长之人，她在 2003 年 1 月 6 日去世，享年 81 岁。她去世前的同一年，她与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班森 (Christopher Benson) 合写的自传《无辜者之死：一个种族仇恨犯罪改变美国的故事 (Death of Innocence: The Story Of The Hate Crime That Changed America)》出版了，让谋杀真相大白于天下，让人间正义伸张于社会，也让悌尔安息于九泉之下。

这件因种族歧视而起的谋杀案件，深深地刺激和影响派克斯，使她知道如果再度沉默那就是自我犯罪的道理，也让她找到了什么是自己下半生要走的正确的道路。

1900 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议会，通过了在全市公共交通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吉姆·乌鸦法律》。根据

这条《吉姆·乌鸦法律》的规定，在公共巴士上，前数排的座位要为白人预留，开车的司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为白人预留座位的排数，其方法就是将一块写着“白人专用”的牌子，放在椅背上，就算是规矩和法律了。

通常来说，因为绝大部分的公共巴士乘客是非洲裔美国人，所以只在最前的两排座位，保留给白人乘客。巴士设有前后两个门，前面的门，仅供白人上下车专用，后面的门，为非洲裔和其他的有色人种专用。

派克斯对抗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行动，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也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关于历史发展偶然性的故事。

1943 年的一个下雨天，派克斯冒着大雨在等公共巴士，因为天气不好，并没有几位乘客。当公共巴士在她面前停住后，被大雨淋得心慌意乱的派克斯，便急慌慌地见门就上。她上了车，定了定神，发现美国白人司机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ke)的恶劣态度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犯了《吉姆·乌鸦法律》的规定：自己是从给白人专用的前门上的车！

派克斯没有理会，一声不响的就往后面专为非洲裔美国人专设的位子上坐下，心慌意乱地整理着被大雨淋湿了的头发和衣服。

待了一会儿，她发现车子根本没动，抬头一看，只见一股藐视和愤怒的眼神，从巴士司机布莱克那里，像一支利箭一样冷冷地射了过来。派克斯的麻烦来了：布莱克把车子停住，慢悠悠地走过来，大声地命令她立即从前门下车，重新再从后门上车。

派克斯冷眼看了布莱克一会，决定息事宁人，照办算了。当派克斯经过白人专用的前排位置时，也许是手上拿得东西太多了，也许是情绪太过激动了，一不小心，自己的皮包掉在白人专用的椅子下面，于是她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低头弯腰去捡回自己的皮包。

布莱克一见派克斯的“黑屁股”居然胆敢坐在白人专用的椅子上，不由得火冒三丈，勃然大怒，立即口出恶言，当众辱骂了起来。

派克斯本来是一位温和平易的女性，平常说话都是轻言细语，这时只好涨红了脸，按照威风凛凛的布莱克的命令，从前门下车，冒着大雨，再从后门重新上车。

派克斯从巴士的前门下车后，正准备到后车门重新登车时，却听见了巴士的关门声！布莱克根本就不给她再上车的机会，巴士夹杂着难听的污言秽语，快速而去，车轮溅起的污水，泼了派克斯一身！她只得冒着大雨，含着眼泪，步行了五英里的夜路回家。

我再告诉阁下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故事。1955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6:00。42 岁的派克斯结束了她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市中心的“飞而雅百货公司(Fair Department Store)”里忙碌的修改衣服的工作，到克利夫兰大街(Cleveland Avenue)搭乘公共汽车回家。

派克斯上车后先付了车资，然后到车后面的第三排，选到挂有专为有色人种而设的第一排坐了下来。同排共有四个位置，另外三个位置，已经有三位非洲裔美国人坐着，她坐在中间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派克斯并没有注意到这部公共汽车的司机，就是在 12 年前将自己在大雨中骗下车而扬长而去的布莱克。巴士按照既定的路线前进。两站之后，巴士上前两排白人专用的位置已经坐满了。第三站时，在“帝国大戏院(The Empire Theater)”的门前，又有数位白人乘客从前车门登上巴士，他们因为没有位置而必须站在那里。

布莱克将车子停住，走到派克斯的面前，一声不响，将座位前挂着的“白人专用”的牌子取了下来，移到了她座椅背的后面。他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连话都懒得说一句，只是用手摆了摆，做出叫他们四个人往后让路的姿势，然后阴阳怪气地大声叫道：

“你们最好是识趣点，把这些位置给我腾出来!(Y'all better make it light on yourselves and let me have those seats!)”

布莱克见他们四位非洲裔美国人纹丝不动，便眼睛一瞪，愤怒地叫嚣道：“把这些位置给我腾出来!”

派克斯旁边的三位非洲裔美国人见到布莱克发火了，不敢惹事生非，于是站起来移到后面去，但派克斯还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布莱克强忍怒气，命令派克斯立即移动。派克斯是移动了，不过不是移到巴士后面的有色人种区去，而是移向了靠窗口的位置上。

满脸怒容的布莱克问她：“为什么你不站起来？”派克斯回答说：“因为我不觉得我应该站起来。”布莱克用严厉的语气警告她说：“好吧！如果你再不站起来的话，我就叫警察来将你拘捕！”派克斯两眼平视，冷静地回道：“你是可以那样做的。”

布莱克不再多谈，走下车到公众电话亭报警处理。白人警察前来将派克斯正式拘捕，并控以她违反《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种族隔离法第6章第11条(Violation of Chapter 6, Section 11, Segregation law of the Montgomery City Code)》的罪名。

警察将派克斯进行拘捕时，她抗议道：“你为什么要胡乱推我？”警察回答说：“我不知道，法律就是法律，你现在已被正式拘捕。”

派克斯在蒙哥马利市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傍晚，尼克松和美国白人民权律师克利福德·杜拉(Clifford Durr)将她从监狱里担保了出来。当天晚上，尼克松向“阿拉巴马大学”黑人女教授乔安·吉布森·鲁宾逊(Professor Jo Ann Gibson Robinson)请教和咨询有关派克斯情况的法律条文，并得到她的全面支持。

鲁宾逊于1912年4月17日生于乔治亚州科洛顿市(Culloden)出生，在家中12位同胞里，排行老幺。她就读的“梅肯公立学校(Macon Public School)”和“瓦利堡州立大学(Fort Valley State College)，全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纯黑人学校。

毕业后，鲁宾逊任教于梅肯公立学校，与维尔伯·鲁宾逊(Wilbur Robinson)结婚，育有一子，但不幸地夭亡。她结束了这段短命婚姻后，进“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英语系进修，1949年秋天，在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任教于德州克罗克特市玛丽·艾伦大学(Mary Allen College, Crockett)，次年任教于“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英语系。

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鲁宾逊参加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一个是“女性政治协会(Woman's Political Council)”。

“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摇篮，金恩、拉尔夫·戴维·阿伯内西牧师(Reverend Ralph David Abernathy)和罗伊·班内特牧师(Reverend Roy Bennett)等当代的民权领袖，都在那里活动。

“女性政治协会”是阿拉巴马州早期的黑人妇女民权运动组织，这是一个以学校黑人老师为主的民权组织，主要的诉求是协助中产阶级黑人填表，登记为选民。

由于阿拉巴马州政府的政策是要用尽所有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阻止黑人拥有投票权，因而“选民运动”就成为

“女性政治协会”与阿拉巴马州政府角力的焦点。

1946年，“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玛丽·费尔亚·伯克斯(Mary Fair Burks)受了“亚特兰大街坊联盟(Atlanta Neighborhood Union)”的影响，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创立了“女性政治协会”，参与第一次成立大会的40位黑人女性，全部通过了阿拉巴马州政府的“特别考试”，成为选民，这个成绩使阿拉巴马州政府将“女性政治协会”列为“捣乱治安”的“坏蛋”。玛丽·伯克斯当选为第一任执行总裁。

1949年年底，在数次被白人司机在公车上当众凌辱后，鲁宾逊向“女性政治协会”提出利用“罢坐公车”来抗议种族歧视的策略，获得全票的支持。“女性政治协会”决定等待下一次的“拘捕”或“偶发事件”时，就立即发动“罢坐公车”运动能够来抗议。

为了替未来的“罢坐公车”运动热身，鲁宾逊发动所有被白人公车司机凌辱的黑人，向“蒙哥马利市交通委员会”投诉，但是全部的投诉，好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没有任何的结果。

1950年，玛丽·伯克斯惧怕来自四方八面的政治压力，和“三K党”的生命威胁而辞职，鲁宾逊接任为第二任执行总裁。鲁宾逊上任后，把摧毁阿拉巴马州公车系统的种族歧视列为受要任务。

1953年，鲁宾逊与三位“蒙哥马利市交通委员会”代表谈判，要求他们雇用黑人司机和废止公车上的种族歧视政策，但被“此乃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市的法律”为理由拒绝。

在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结果后，鲁宾逊又直接与“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谈判，虽然亦是没有任何实际性的结果，仅得到了在黑人住宅区每一个街口增设巴士站的微小让步。

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部》裁定在公立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后，鲁宾逊以“女性政治协会”总裁的身份，致函“蒙哥马利市交通委员会”，发出严重警告说，如果不在改善在公车上的种族歧视政策，“罢坐公车”的抗议运动，随时会爆发。

温和的警告没有发生任何的实际效果，傲慢的“蒙哥马利市交通委员会”白人官僚连礼貌性的回信都没有一封。鲁宾逊知道了一个事实，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方法就是发动强大而持久的“罢坐公车”抗议运动。

1955年12月1日，派克斯因为在公车上拒绝让位于白人而被拘捕，这个久等的机会使鲁宾逊决定率领着“女性政治协会”全力以赴地发动“罢坐公车”抗议运动，在得到了派克斯的同意后，在一夜之间，“女性政治协会”向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印发出三万五千份《为蒙哥马利市当局无理拘捕罗莎·派克斯女士而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声明书》传单，号召全体黑人参与“罢坐公车”抗议运动。

1955年12月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礼拜天。在蒙哥马利市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里，整个教堂的人并没有闲情逸致来享受美好的天气，教友和牧师们无一例外地讨论着如何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的运动。

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法庭开庭审判派克斯的两项所谓的罪名：第一是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第二是违反当地的《吉姆·乌鸦法律》条例。

蒙哥马利市法庭的法官，大概也闻到了全市无所不在的民权火药味，不敢轻举妄动，反倒有点虎头蛇尾，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做法。整个审判，在短短的30钟之内结束：派克斯两条罪名全部成立，罚款10元，另加4元的法庭开庭费，总共是14元。派克斯当然不服，立即将案件提起上诉。

1955年12月5日，大家在成功地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一整天后，大约有18位蒙哥马利市非洲裔美国人民间领袖，聚在“锡安山教堂(Mountain Zion Church)”，开会讨论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运动的成败得失，和未来应该执行的运动策略。尼克松在会议上向着与会者兴奋地说：“看啊！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

会！”

大家商量了老半天，也始终拿不出一个全面的和有效的策略。几经讨论，大家初步得出了两个共识：第一，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抗争运动；第二，需要一个全新的组织站在台前，来领导这场历史性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抗争运动。此举并没有得到所有参加会议者的赞同，有一半的牧师因为会议太偏激而半路退场。

会议并没有因为有半数人员退场而中断。一向是德高望重的阿伯内西牧师，他向大家提议用“蒙哥马利改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为名，使它成为非洲裔美国人民权抗争运动的总部。这个会议，拉开了美国近代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的序幕。

鲁宾逊加入“蒙哥马利改进协会”，出任中央委员，兼《蒙哥马利改进协会周刊(weekly MIA Newsletter)》总编辑事务，全程参与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的“罢坐公车”抗议运动。

蒙哥马利市警察局把鲁宾逊列为“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一位穿着制服的白人警察穿用石头砸破了她的窗户，另一位则把一瓶硫酸浇满她的车子，作为警告。

为了避免使同事们受到自己的牵连，鲁宾逊在1960年毅然辞掉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的职位，这使她更无后顾之忧的全力参与。一场美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民权运动，就此爆发。

1960年，鲁宾逊在摧毁掉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的种族歧视政策后，移居并任教于路易斯安那州“格兰布林大学(Grambling College, Louisiana)”，一年后定居加州洛杉矶，继续在学校里教书，她于1976年退休，在家撰写回忆录《罢坐蒙哥马利公车的女性发动者(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nd the Women Who Started It)》，1987年，“田纳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将之出版发行。

在《罢坐蒙哥马利公车的女性发动者》中，鲁宾逊是这么赞美蒙哥马利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他们虽然被压迫，但是却异常的勇敢，他们征服了恐惧，面坦然对即将到来的严重后果。这场抵制运动是我们所有参与者最美丽的回忆，它带领着我们到达安全的地方。”

金恩在《向自由迈进》中，肯定鲁宾逊在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运动中的贡献说：“她用坚定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每一层次的抗议运动中，都比任何人积极参与。”鲁宾逊的晚年体弱多病，在1992年谢世，享年80岁。  
(待续)

2011年1月8日 高胜寒 在美国华府